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马克思恩格斯的 哲学变革之路

赵家祥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的 哲学变革之路

赵家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之路 / 赵家祥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ISBN 978 - 7 - 5161 - 7732 - 7

I. ①马… II. ①赵…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579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苗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27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赵家祥，男，天津市武清区人，1937年6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系党委书记、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1980—1994年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首席专家，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的统稿和修改工作、《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初稿撰写和修改工作。著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唯物史观的核心与当代现实》、《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历史过程论和历史动力论》、《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等十余部著作和教材，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总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既是时代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理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这里讲的传承，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传承，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这里讲的发展，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不断创新，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突破与提升。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两种传承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的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后人的理解和阐释，不可能离开后人的研究来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对后人的传承与发展加以重视和关注。这也正是我们组编这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的初衷。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冯定教授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1978年以来，黄枬森教授等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拓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使其成为全国重点学科。

多年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其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成为本学科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成功开创，形成了独特

的研究特色。由黄枬森等教授主持编写的以及与国内同行共同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全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学科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发展的需要，逐渐拓宽了研究领域，形成了这样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文本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和文本内容研究；二是基本原理的专题性研究，特别是历史哲学的研究；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主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对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人学和发展理论的视角予以新的探讨。这些研究方向的确立，意味着研究不再仅仅限于传统教科书的框架，同时面向现实问题研究，从而走向新的融合。

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学术界多年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研究的学术性，有的强调研究的现实性，彼此形成不同的倾向和主张。实际上，二者并不构成矛盾与对立，而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不能正确理解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正确地阐释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仅仅限于这样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为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一些原理的“诠释学”“考据学”，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也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系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伴随实践的发展，许多基础理论也要不断深化、调整和完善。关注现实问题，加强“问题导向”，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得到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给文本中许多思想赋予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其思想资源，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就此而言，加强现实问题研究，又会有力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实现二者有机结合，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这也正是本学科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拓展研究方向与领域的动因所在。

收录在本论丛的书目，都是本学科老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老教授虽已离开教学岗位，但不少人始终是“退而不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成果不断，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论丛写作的时间来看，既有过去撰写的，也有新近创作的，有的完全是近几年研究的成果；从其内容来看，涉及的论域比较广泛，既有关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又有关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其关注的重点来看，既有基础性的问题，又有前沿性的问题；从其研究的领域来看，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涉及的各种领域，又有与其相关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这些成果是这些老教授长期研究的真实记录，是他们探索轨迹的生动描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绚丽画卷。

本论丛只反映了本学科过去研究的一个大致图景，并未体现其研究的全部历史和现状。收录的书目主要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或代表性观点。尽管各位作者研究的重点不同，旨趣各异，但其目标指向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不断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求发展、创新。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各位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论丛所收集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和作者们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者都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出生的，大多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走进大学校园，而后留校任教。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其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和感悟。这些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个人体验的印记。今天看来，在这些成果中，尽管有些话题可能有些陈旧，某些看法也不一定新颖，但其确实反映了这些作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思考和艰辛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是本学科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它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梯。

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同仁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一直以高度的热忱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只要充分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光荣传统，锐意进取，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将会把新的成果集中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丛书加以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的发展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建议并捐资设立了“黄枬森与北京大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学科发展”项目（简称“黄枬森项目”），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感谢！

本论丛的出版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本论丛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论丛的策划和出版作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论丛编委会

2016年4月

自序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列经典著作，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态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己著作的态度一脉相承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序言中，针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的歪曲，说了下面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① 我们应该把恩格斯这段话看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方法，须臾不可背离，要原原本本地深入研读和准确阐释经典著作的思想，切忌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变味或走样。恩格斯在晚年多次讲过，马克思在世时曾经针对那些歪曲他的思想的人所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严正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诙谐而带有讽刺意味地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② 但在我国理论界，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有时却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误读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观点变味或走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据笔者考察，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受苏联学者的消极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搜集、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做出了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必须承认的。但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在一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不符合、甚至违背其原意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作了不正确的阐释，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比较突出。苏东剧变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很多方面克服了苏联学者的消极影响。但由于苏联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同学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评价也不尽一致，一些消极因素仍然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我国一些学者。

第二，受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各种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学者们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也出现了不少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用了一些不正确的研究方法，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甚至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敌对态度的学者，恶意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我国有些学者由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功过是非研究不够、辨别不清、判断有误，把其中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研究方法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加以接受，甚至大加渲染，极力模仿和提倡，言必称“西马”，用“西马”的观点和方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或曲解。

第三，受现代西方解释学的影响。现代西方解释学认为，文本没有不依赖于解释者的自身固有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通过读者的理解生成的，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各不相同，它们都有平等存在的权利。退一步说，即使文本有自身的意义（本意），读者也是无法把握的，理解的目的不是把握文本的本意，而是生成文本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没有不依赖于读者自身固有的意义，它的意义是通过读者的理解生成的，不管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哪怕是歪曲的解释，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和否定，也有其存在的权利。按照这种解释学的观点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必然会变味或走样。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论述作过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些理论观点，本来阐述得条分缕析、明白易懂。但有些学者可

能是为了联系我国的实际，也可能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创新”，或者是主观随意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概念和观点作过度的解释，于是就把本来清楚明白、通俗易懂的观点弄得极其晦涩难懂，甚至面目全非，令人不知所云。如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论述的过度解释，就是如此。对于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笔者已在本书下篇第14个问题中作了阐释。

第五，片面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当前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不是指用当前的实际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我国有些学者，不是根据经典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面临的问题，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原意，而是按照今天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的论述，这就难免削足适履、为我所用，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例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两个互相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句话本来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概括，很多学者却把它解释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且因为其中有“融合”二字，就把这句话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根据。这完全是望文生义、风马牛不相及。^①

为了实现恩格斯提出的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作的原样”去阅读他们的著作，避免“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或曲解，笔者对改进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方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中，要把“史”、“论”、“著”有机结合起来。“史”是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著”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我国高校大多数哲学院系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三门主干基础课。这三门主干基础课分别由不同的

^① 赵家祥：《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对〈哲学的贫困〉中一段话的解读》，载《理论视野》1913年第11期。

教师讲授。这种课程设置的弊端在于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门不同的课程，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师又往往不太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讲授某一本或某几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教师又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这种肢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甚至会对它造成各种曲解或误读。建议我国高校的哲学院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门课合并为一门，以讲授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哲学经典著作为重点，使学生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全面、准确、深入、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而是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就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通向实际生活（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的中介，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理论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会蜕变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同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跌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怀抱。如果无视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重新沦为烦琐的、脱离实际生活的经院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它的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丧失自己原有的性质，并导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著作，都是把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融为一体。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首先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它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把三个组成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典范。本书下篇的9个问题，讲的都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问题。

第三，要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专题史。我国已经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这些都可以称为“通史”。我国还很少见就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基本原理写的发展史，笔者把这种发展史称为“专题史”。只有“通史”，而没有“专题史”，对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在我国高校哲学院系，在本科生阶段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史，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仍然讲授这种通史，这在深度和广度上只能有量的扩张，不可能有质的飞跃。所以硕士研究生对于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兴趣不高，因为它与本科生讲的课重复太多。建议高校哲学院系，要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史，如唯物主义各种形态的演变史，辩证法各种形态的演变史，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史，历史（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发展史，社会发展“合力论”和“交互作用论”的理论发展史，历史评价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发展史，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理论发展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史，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发展史，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发展史，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发展史，人的本质理论发展史，等等。在本科生阶段讲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通史”，在研究生阶段讲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史”，使教学由浅入深、由通到专，不断拓展和深化，这有利于避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变味或走样。

第四，要编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为了帮助青年学生和党员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需要编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近些年来，我国编写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笔者发现不少导读有一个通病，就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的概念和观点，说明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学习者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这种做法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简单化、教条化、凝固化。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著作中，对同一个概念或同一条基本原理的阐释往往不完全相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的同一种解释取代不同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的阐释，势必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简单化、教条化、凝固化的理解。其次，这种做法离开经典作家个人的特点、风格和气派，离开经典作家论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语境，难以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原意，

容易出现对作者思想的偏离、误解。再次，某一部经典著作或某一部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篇章，本来是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环扣一环地阐明马克思主义某一重要的基本原理的，有些导读却把这些基本观点分隔开来、孤立起来加以论述，使读者看不出经典作家论述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本来是用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系统地说明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一极其重要的基本原理的，有的导读却把这一系列说明分割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根源、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四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读者很难深入系统地理解恩格斯的逻辑性极强的阐述。最后，经典著作中有一些概念和观点，具有较大的难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很难涉及和解释清楚这些难点，不可能达到解疑释惑的作用，这个任务应该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来承担。现在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只注重归纳、概括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而且这些概括和归纳又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中移植过来的，而不注重对经典著作中难点的释疑解惑。例如，有人写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导读，不指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两个命题仍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命题，不考察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对这两个命题的论述，使人误解为这两个命题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成熟观点。有人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对于“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异同，不做任何解释，甚至把二者看作完全相同的概念。有人写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导读，对马克思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①是指未来社会哪一发展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国家制度只字不提，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有人写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导读，对列宁所说的“非政治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②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以及这种国家与马克思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如何，也是只字不提，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0、95页。

“非政治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本来含义。这样的导读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帮助不大，忽略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间的差别。因此，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需要改进写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的指导思想和写作方法，写出一批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以帮助青年学生和党员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五，要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远不改变的僵死的教条。在 1886 年 12 月 18 日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后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一连串的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在 1887 年 1 月 12 日致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信中又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既然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是发展着的理论”，他们在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需要回答的特定问题讲的，因而都具有相对性，都只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适用，我们就不能把它们看作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范围内都适用的绝对真理，看作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恩格斯在 1893 年 6 月 6 日致菲利浦·屠拉梯的信中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杰维尔在很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观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② 我们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写成的一部最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就是对于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也认为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相对的。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因而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0、5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9—80 页。

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不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

第六，要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列宁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 我国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思想封闭，“唯我独马”，认为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只有自己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歪曲和背离，甚至有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提出质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姓“马”，即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前面已经讲过，笔者并不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学者的有些理解确实有意无意地歪曲和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甚至有人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对马克思主义持敌视态度，对于这些我们应该予以澄清和反对，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不少独到和合理之处，吸取他们的合理思想和有益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各种文献资料，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和不可缺少的。我国一些中青年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应予以肯定和鼓励。

本书是在笔者最近几年发表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文中精选的 17 篇论文，经过润色、推敲汇集而成的。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主要包括两类问题：一类是对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评析学术理论界对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不恰当评价；另一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一些重要理论观点的阐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 页。

释和历史考察，评析学术理论界对这些理论观点的误解。下篇论述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思想，重点论述唯物史观，说明《资本论》不仅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伟大的哲学著作，澄清学术理论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思想的一些误解。简言之，本书的根本宗旨是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和恩格斯的教导，“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学会按照作者的原样”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